

饶良伦 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

3.0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

饶良伦 著 1986·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封面设计：张乙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

Tudi Geming Zhanzheng Shiqi De Zhuoyi Wenhua Yundong

饶良伦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鹤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4/16·插页2·字数65,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55

统一书号：11093·219

定价：0.68元

总 序

历史是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人们才能够更全面、更清楚地看清现实和看清自己，才能够认准前进的路子。这个道理对于个人，对于整个国家社会都是适用的。我们的祖先直称历史为“鉴”，应该说这对历史的本质和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是有深刻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的正确思想路线，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把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国情，当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出发点。而今天的中国又是昨天和前天中国的继续和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昨天和前天的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研究和了解中国国情，这个任务本身，就包含着研究、了解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两个方面的内容。就当前来说，只有全面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才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可见研究和学习中国革命史，特别是研究和学习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涉及我们党制定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大问题，是涉及每个同志理解和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大问题。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的确，历史是不会重演的，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无论实践的内容或斗争的形式，都不可能完全是历史的重

复，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总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先人的革命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伟大力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间，我们的祖国是灾难深重的。因此，我们的先辈发出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呼号，他们牺牲救国的业绩是可歌可泣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更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的新社会。一个遭受过百般凌辱的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的逻辑非常明确：我们这一代，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要继承我们先人的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再向前推进，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

总之，我们认为，研究和学习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学习和研究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

这套丛书是我们编写组的同志们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习作。我们力图把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在书中反映出来，并把现代革命史的重大斗争事件，以专题的形式，逐个写出，汇成丛书，使读者单本读来可以了解一件革命运动的历史，全部读来又能掌握整个现代革命史的概貌，为当前广大干部和青年的空前的学习热潮做一点贡献。

由于我们水平很低，错误一定很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唐纯良

前 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①。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始至终就存在着两个战线：这就是一个文化战线，一个军事战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同当时的武装斗争一样，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一败涂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辉煌胜利。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既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扬光大，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光荣先驱，它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化史上都将永远光芒四射，千古留芳！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战斗历程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特点和光辉业绩。他说：“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6页。

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①

今天，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学习与继承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对于我们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图大业，有着重大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5页。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一、残酷、野蛮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
(一) 扩散封建糟粕.....	2
(二) 鼓吹法西斯主义.....	4
(三)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7
(四) 禁书又杀人.....	9
二、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成长.....	15
(一) 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	15
(二) “左联”和“社联”的成立.....	20
三、左翼文化运动的光辉战绩.....	26
(一) 文化领域内的光辉成果.....	26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	35
(三) 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	37
四、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43
(一) 反对“新月派”的斗争.....	44
(二) 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52
(三) 反对“第三种人”的斗争.....	58
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激烈论战.....	65
(一)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 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66

（二）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76
（三）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88
结束语·····	96

一、残酷、野蛮的反革命 文化“围剿”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比北洋军阀更残暴、更黑暗、更富欺骗性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极端恐惧和仇恨。他们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的火焰。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到处网罗反动文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扬封建法西斯文化，妄图独霸文化领域；另一方面又依靠军警宪特和地痞流氓，采取种种恐怖和血腥手段，疯狂禁书又杀人，竭力摧残革命文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文化“围剿”，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手段的残酷和办法的严密，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扩散封建糟粕

国民党反动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把传统的封建文化当作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对抗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的思想工具。早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明令尊孔。蒋介石亲到曲阜朝圣，以为表率。“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在“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恢复固有文化”的借口下，不遗余力地扩散封建糟粕。

蒋介石曾经一再诬蔑共产党“毁弃”“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精神、文化，”以至“弄得人欲横流，四维灭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他声嘶力竭地叫嚷：“今后我们要抵抗外敌，洗雪国耻，完成革命，复兴民族，非把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恢复转来不可。”而“要恢复民族精神”，“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①。

在蒋介石的亲自倡导下，从一九三四年起，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大张旗鼓地发起了以恢复封建旧道德为中心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强令全国人民都“必须以‘礼义廉耻’为生活之规律”；一面又狂热提倡“尊孔读经”。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中央常会相继通过了《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关于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不仅竭力提倡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而且公然规定每年孔子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通令全国各机关、学校于该日举行“孔诞

①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1932年5月23日。

纪念大典。”国民党“理论家”戴传贤（即戴季陶）和地方军阀陈济棠、何键对于扩散封建糟粕更是特别卖力。戴传贤一再强调：“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学说为充实。”他号召“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陈济棠在广东不仅亲自“编著”《孝经新诂》，“聘请讲师轮回宣扬孔孟经义，”而且强迫中小学生学习《经训读本》。何键在湖南也创办孔道学校，并严令中小学一律开设读经课。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力提倡和推动，因受大革命打击而一度消声匿迹的“遗老遗少”、封建文人又都出来摇簧鼓舌，舞文弄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空前规模的复古主义逆流。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纷纷祭孔子，祀关岳。据当时报纸记载，其“崇敬之隆，以视历朝盛典，殆有过无不及。”“读经救国”、“古文复兴”的声浪，也甚嚣尘上，高唱入云。《教育杂志》出了《读经问题专号》，发表了不少主张“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的奇文。汪懋祖、许梦因等发起文言复兴运动，主张禁用白话，专习文言。江亢虎在上海纠集六十余人组织“存文会”，“旨在保存文言，普及文言教育，以作文章报国。”尤其荒唐的是恢复封建礼教和宗教迷信的活动。在所谓“正人心救世道”的口号下，南北争相举办“敬老会”、“节妇宴”，各地到处旌表“孝子”、“烈女”。什么禁止男女同校，男女同泳，男女同座，男女同行；什么取缔“奇装异服”，“严禁女人养雄犬”；什么诵经礼佛，迎神赛会，作法求雨，建醮扶乩等奇谈怪事，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遭到舆论界的痛斥。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①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社等十七个团体和任白戈等一百四十八位作家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也明确指出：“我们以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维新’的路上走去，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②

（二）鼓吹法西斯主义

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派用以对抗我党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又一个重要“法宝”。

蒋介石对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曾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之政治理论”，“高唱自由”，“效

① 《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诃德》，《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20页。

② 《新生》周刊二卷21期附《读书与出版》第2号。

能迟钝”，其“弱点已充分暴露”，“若谓得此即可以致郅治，是何异挟此以自欺”；当今之世，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他把法西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据他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依国家机体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①为了学习法西斯主义，蒋介石组织了各种“考察团”去德意考察，并选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和大批党徒去受训。同时又从德国请来许多高级顾问，传授法西斯统治方法。

在蒋介石的带头鼓动下，国民党反动派迅速掀起了一股法西斯主义狂潮。他们疯狂叫嚣：“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鼓吹要“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要“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为用”等等。国民党官办的报纸刊物，无不充满了法西斯毒素，尤其是《扫荡报》、《社会主义月刊》、《汗血月刊》、《汗血周刊》、《中国革命》、《进展》、《前途》等报刊，简直成了专门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宣传介绍法西斯主义的书籍，如《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传》、《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言论集》、《法西斯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等，更是汗牛充栋，泛滥成灾。

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以黄埔军人为核心的“复兴社”，对推行法西斯主义特别热心。复兴社本来就是以墨索里尼的

①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5日。

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法西斯蒂组织，因此，该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提出“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限期剿灭各地赤匪，取缔一切反革命”，“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硬干、实干、快干”等口号，狂热推行法西斯化运动。

本来蒋介石为了贯彻其分而治之的原则，曾经规定，复兴社以军队为活动阵地，文化教育领域则为另一法西斯蒂组织CC系的地盘，但复兴社不甘受此限制，千方百计想要插足文教阵地。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复兴社在南昌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学会”的外围组织，以大学校长、教授以至于一般文化人为吸收对象。“中国文化学会”发表的《我们的主张》，公开声明，他们发动的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应读作法西斯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接着，他们又在《前途》月刊二卷八期上出了一个《文化统制专号》，刊载了一系列鼓吹实行“文化统制”的文章，公然大叫大嚷，说什么：“文化被统制于民族精神，则国家的一切，无论政治、伦理、道德、学术思想，可上轨道，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统制。”

CC派对复兴社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并无不同意见，但他们不能容忍复兴社侵犯他们领地的“越轨”行为。一九三四年陈立夫赶紧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并出版了《文化建设》月刊作为机关刊物，以与复兴社对抗。不久，陈立夫又向蒋介石告状，由蒋介石下令解散了“中

国文化学会”，重新恢复了CC派对文教阵地的独霸地位。

（三）所谓“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CC派鉴于露骨的复古论和法西斯宣传激起舆论界普遍而又强烈的反对，于是改变了手法，采取了比较曲折、隐蔽的方式，来推销封建法西斯文化。陈立夫在《文化建设》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文化建设论》中，鼓吹所谓“中国文化新建设的准确路线”，应“不以片面的发扬固有文化或片面的吸收西方文化为运动的目的，乃以一面发扬固有文化，一面吸收西方文化”，并“顾及时空之需要而求适应，依据生之原理，调整中西文化，使物质与精神同时得以发展。”

在陈立夫的授意下，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CC派的反动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埭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等人，在《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所谓“本位文化论”。《宣言》竭力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涂脂抹粉，说什么：“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宣言》作者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打出“不守旧，不盲从”的招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应以“此时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从事“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

《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立即纠集各地反动文人，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之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各种反

动报刊不仅全文转载，而且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评专论。上海、北平、南京、武汉等地相继召开座谈会。他们肉麻地吹捧《宣言》是什么：“国民睡觉中的一声警钟，众生迷路时的一个指针，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的一条出路。”^①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吹大擂，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进步人士一眼识破了他们的鬼把戏，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本位文化”不过是封建法西斯文化的代名词而已。中间人士批评“本位文化论”过于笼统、空洞和抽象。“本位文化派”为了赢得中间人士的支持，不得不对自己的主张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王西征的《中国本位文化要义》，特别提醒人们：《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只字未提“民权主义”，绝不是十教授的疏忽，而是因为“现阶段的‘国家社会主义’以‘独裁制’为必要的条件，所以不需要‘民权’的发展，这是一切自由主义者所当认识的。”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本位文化’之较为简单浅显的解释，为：不同于德、义的，中国的，‘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更较简明浅显的解释，为：‘二民主义’的文化。”同年六月五日，张大同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了《文化的选择问题》，对《宣言》中提到的，对于旧文化，必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作了注释。该文强调：“中国的孝和贞及其他所讲的礼、义、廉、耻、忠、信、和平，孔孟倡导于先，程朱王陆发扬于后，……这种伦理道德的精神，……实有保

① 许性初：《从五四运动谈到一十宣言》，《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5期。